

普列漢諾夫著

雪峯譯

藝術與社會生活

世界學術名著譯叢
生活書店發行

世界學術名著叢譯

藝術與社會生活

普列漢諾夫著

雪峯譯

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六月

世界學術名著叢譯
藝術與社會生活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著者 譯者 發行人 發行所 特約經售處

普列漢諾夫 雪峯 徐伯昕 上海重慶南路六號
 重慶·香港·星加坡 聯營書店 漢口·重慶·成都

基定價本 國幣五圓
 外埠酌加郵費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勝利後第一版

改譯本序

這一個小冊，初譯成中文出第一版是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係根據藏原惟人的日譯重譯，曾編入當時的「科學的藝術論叢書」中。普列漢諾夫的原作，則初爲一九一二年十月在巴黎及列日進行的演講，後經改作發表於「近代人」雜誌一九一二年第十一號，十二號及一九一三年第一號上，今已收在全集第十四卷裏。我的譯本曾經再版，但近來重讀一過，覺得譯文有生澀及不妥之處。現即改譯數處及更動字句頗多，重排出版，以謝讀者。至於原著見解中之可議者，本想不自量力，試附以指明的，但想到我國學術思想界亦已略能識別，茲不再贅。

序

現在想在這裏請讀者注意的這著作，是將本年十月我在列日及巴黎，用俄國語朗讀的那「報告」改作成的東西。因此，在本篇裏就留着一些朗讀的體裁。在第二章的煞尾，我將盧那卡爾斯基（A. Lunacharsky）氏在巴黎公開對我表示的關於美的標準的問題的那反駁，下了檢討。那時我曾在口頭上辯答過了，但現在付印時在這問題上停留一下，我以爲有益的。

著者 一九二二年

關於藝術和社會生活的關係的問題，在一切有某種程度的發達的文學上，都會盡了非常重要的任務。而且這問題常常在兩種完全對立的意義上被解決着，正在被解決着。

有些人曾說，現在也還在說——人並不是爲了土曜日而存在，是土曜日爲了人而存在的。社會並不是爲了藝術家而存在，却是藝術家爲了社會起見纔存在的，藝術非幫助人類意識的發達，社會構造的改善不可。

另一些人却決定地反對這見解。據他們的意見，則藝術，牠本身就是目的。他們說：無論藝術是怎樣高尚的東西，倘若當作達到某種別的目的的手段而使用牠，是使藝術作品的價值降低了。

這二種見解的第一種，在六十年代的我們的前驅的文學中，能看出牠的分明的反映。例如皮沙列夫（Pisoreff），就執着那極端的一面性，竟將牠發展到 Caricature（漫畫）的程度，是不必說的了；我們還能夠舉出在當時的批評上，這見解的最根本的擁護者——車勒芮綏夫司基（Chernyshevsky）和陀布洛留僕夫（Dobroloubov）來。車勒芮綏夫司基在他的最初的評論之一裏這樣寫着——

『「爲藝術而藝術」，在我們的時代是和說「爲了富而富」，「爲科學而科學」等等，同樣奇怪的思想。人類一切的事業，要使牠不變成空虛的無用的東西，就非服務於人類的利益不可。就是，富是爲了人們要使用牠而存在，科學是爲了做人們的指南針而存在的；藝術也不是爲了無用的滿足而存在，牠非爲了某種本質的利益而服務不可。』依車勒芮綏夫司基的意見，則藝術——尤其那「最嚴格的藝術」的詩歌的意義，是看牠普及在社會之中的廣大的知識而決定的。他說道——『藝術，正確地說來是詩歌（只有詩歌，因爲別的藝術在這意義上並不重要），使非常多的知識擴張在讀者大衆之

中，更其重要的事情是使那依據科學而成的理解普及着，——這是詩歌對於生活的偉大的意義。』（註一）在他有名的學位論文「藝術對於現實的美學的關係」中，也有和這相同的思想。照他的十七個提要（Thèse）說來，則藝術不僅是再現生活，並說明生活。那作品是常常「有着關於生活現象的判決的意義」的。

以車勒芮綏夫司基及爲其學徒的陀布洛留僕夫的見解看來，則藝術的重要的意義，是在再現生活，並對生活現象下判決。（註二）而且還不但只是文學評論家及藝術理論家如此看法。涅克拉梭夫（Nekrassov）就把自己的詩神（Muse）名爲「復讎與悲嘆」之神，而這不是偶然的事。在某篇詩中，市民向詩人像下面似地說道。

你詩人，天所選擇的人

永遠的真理的告知者呵！

不要相信沒有麵包的人

（註一）車勒芮綏夫司基全集第一卷，三三——三四頁。

就不值得譜入你的豫言的絃罷！
不要以為人們完全死絕了！

在人們的靈魂裏神依然生存着，

從信者的胸裏發出的悲歎

常常辨識着你的絃音！

做個市民罷！委身於藝術

(註二)這見解就是培林斯基(Belinsky)在他晚年所完成的那見解之部分的重複與部分的發展。培林斯基在「對於一八四七年的俄國文學的見解」這論文中，這樣寫着——「社會的最高的最神聖的利益，是那平等地分配給牠各員的真實的幸福。向這幸福去的路——是認識，而藝術是在引導到這認識的一事上有著不劣於科學的力的。所以，科學和藝術都是同樣地必要的，不許科學代替藝術，也不許藝術代替科學。」但是，只有「在生活現象上」下了「判決」，藝術纔能使人們的認識發展起來，這樣，車勒茵綏夫司基的學位論文，是和培林斯基對於俄國文學的最後的見解相關聯的。

並且爲了近傍的人的幸福而活着呵——

把天才委置於

擁抱着萬物的「愛」的感情。

市民涅克拉梭夫，用了這個話表明了關於藝術問題的自己的意見了。即在造形藝術的領域，例如在繪畫上，當時的更良好的代表者，也抱着和這相同的意見。貝洛夫或克浪斯珂伊，是和涅克拉梭夫同樣，一邊服務於藝術，一邊「想做市民」的；他們和涅克拉梭夫同樣藉自己的作品「在生活現象上」下了「判決」了。（註一）

（註一）克浪斯珂伊從門敦寄給 V. V. 斯塔沙夫的，一八八四年四月三日發的信，就證明了他強烈地

受了培林司基，戈果理，非陀特夫，伊凡諾夫，車勒茵綏夫司基，陀布洛留僕夫，貝洛夫等見解之影響。

（伊凡·尼古拉耶維奇·克浪斯珂伊，他的生活，書簡及藝術批評論文，一八八八年彼得堡版，四八七頁。）但是，在克浪斯珂伊的批評論文裏所看見的關於生活現象的判決，不必和車勒茵綏

夫司基或陀布洛留僕夫的相比，就是和烏斯潘斯基（G. I. Uspensky）的相比，在那明確性上，

也是分明地拙劣的東西，——這有在這裏附記一下之必要。

關於藝術創造的問題站在和這相反的立場上的見解，在尼古拉時代的普式庚（Pushkin）那里，有着牠的有力的擁護者。「賤民」或「寄於詩人」的那樣的詩，是當然什麼人都知道的。人民向詩人要求，要他用詩歌來改善社會的道德，但他給了輕蔑的，說起來是粗暴的回答。

向那邊去罷！平和的詩人

與你們有什麼關係呀？

趕快在淫亂中化石罷——

豎琴的聲音不使你們復活！

對於我的靈魂，你們真像墳墓一般討厭。

對於你們的愚昧與怨恨

到現在為止，有鞭笞

和牢獄，和斧鉞存在着——

在你們狂亂的奴隸，這些正十分够了！

關於詩人的工作的見解，由普式庚表現在下面的他常常重複着的言語中。——

也不是爲了生活的騷擾，

也不是爲了利慾與鬥爭，

我們是爲了靈感，

爲了甜美的辭句與祈禱而活着的！

在這裏，我們就在我們的面前，於最明快的公式之中，看見爲藝術而藝術的理論了。六十年代的文學運動的反對者，那樣喜歡引用普式庚，也決不是沒有根據的。

這二個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場上的關於藝術問題的見解之中，應該承認那一個是正當的呢？

在着手這問題的解決之前，必須先明白這問題不應這樣設立。關於這問題，也和對於別的和這類似的問題同樣，不可從「應當做」的觀點來看牠。倘若在當時的時代裏，當時的藝術家迴避着「生活的騷擾與鬥爭」，而在別的時代裏却相反，向着鬥爭，也

向着和鬥爭有必然的關係的騷擾，渴望似地突進着，那麼，這決不是因為外部的人們會對他們，在相異的時代裏課了相異的義務（不可不做的）的緣故，却是因為，在某一社會條件之下有某一精神支配着他們，而在別的條件之下就有別一精神支配着他們的緣故。就是對於事物的正確的態度，是要求我們不要從「應當做什麼」的觀點，却要從「以前存在着什麼，現在又存在着什麼」的觀點來看。因此，我們把問題像下面一樣地安置罷——

使在藝術家及對於藝術的創造有着直接的興趣的人們之間，發生為藝術而藝術的傾向，並且使這傾向強大起來的，那社會條件之中，何者是更重要的？

倘若我們能夠接近這問題的解決，則那時候，解決和這問題有密接關係，有同樣興趣的下面的問題，也會易容起來罷。

使在藝術家及對於藝術的創造有着直接的興趣的人們之間，發生對於藝術的所利的見解，換言之就是想在藝術作品上附加「關於生活現象的判決的意義」的

傾向，並且使這傾向強大起來的社會條件中，何者是更重要的？

這二個問題的第一個，使我們不得不再想起普式庚來。

就是他，也曾有不擁護爲藝術而藝術的理論的時代。他會有不迴避鬥爭，反而向牠突進的時代。亞力山大一世的時代就是這樣的。那時他不以爲，「人民」是應該以鞭笞或牢獄或斧鉞滿足的了。反之，他懷着憤怒在那時自己的頌詩「自由」中叫道——

唉，無論看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都是鞭笞，什麼地方都是鐵，

法律的苛酷的恥辱，

束縛的無力的眼淚，

什麼地方都在偏見的濃霧中

不正的權力……云云。

但其後他的精神根本地變了。在尼古拉一世的時代裏，他獲得了爲藝術而藝術的

原理。在他的精神中的這個大變動，到底因什麼而起的呢？

尼古拉一世登台的初頭，是以那十一月十四日的破綻（即一八二五年所謂十二月黨反

叛的失敗——原譯者）

而有名的這件事，正和對於我們的「社會」將來的發展同樣，對於普式庚的個人的命運也給了大大的影響。和「十二月黨」的敗北同時，在當時的「社會」上的最有教養的前衛的代表者，都離退了舞台了。結果，這不能不使那道德的知識的水平，顯著地低下了。海爾岑（Herzen）寫道：『我雖然很年輕，但我記得在尼古拉登台的同時，上層社會是怎樣顯明地頹廢着，腐敗着，變成爲盲從的了。亞力山大時代的那種貴族式的獨立，近衛隊式的剛毅，是和一八二六年一起消滅得無影無跡了。』在敏感的賢明的人，生活在這樣的社會裏是苦痛的。『在周圍是藪，沈默——同一海爾岑在別的論文中寫道，——一切都是沒有反應，沒有人氣，沒有希望，並且極端地遲鈍，愚蠢，縮小着了。那尋求同志的視線，倘不是從僕的威嚇，就被以驚愕來接受，人們是從他背過身去，或者給他以污辱了。』在相當於寫了詩「賤民」及「寄於詩人」的時代的普式庚的

書信中，就可以不斷地遇見對於在我們的二都市裏的倦怠與庸俗的不平。但是他不但在圍繞着他的那社會的庸俗裏苦惱着而已，他和「統治階級」的關係，也毒害了他很多的血。

在我們之間有這樣的一個實在可感動的傳說流佈着——一八二六年尼古拉一世可感謝地「寬赦」了普式庚的政治上的「稚氣的過失」，甚至成爲他的可感謝的保護者了。但事實却完全不是這樣。尼古拉和在這種事業上爲他的一隻右腕的那憲兵隊長阿·哈·屏坑特勒夫，却一點也不「寬赦」普式庚，而且對於普式庚的「保護」，這在普式庚是無限的，不可認耐的輕蔑。一八二七年屏坑特勒夫向尼古拉訴說道：『普式庚和我會晤了以後，曾在英國俱樂部裏歡樂地說及陛下，並且還強制和他在一起吃喝的人爲陛下的健康而乾杯呢。總之，他是一個正真的笨漢，倘若指導他的筆和詞藻而得成功，那是有益的。』這最後的一句話，將加給普式庚的那「保護」的秘密，展開給我們看了。這是想把他造成爲一個現存秩序的讚美者。尼古拉和屏坑特勒夫，是以馴順普

式庚以前的強暴的詩神，使其走上了官家的道義的路爲目的的。當普式庚死後，元帥巴斯凱維奇送信給尼古拉，寫了『普式庚當作一個文學者是可痛惜的』這話的時候，尼古拉是這樣回答了，——『你的意見，我也同感。關於他（即關於普式庚，並不是關於意見，——蒲力汗諾夫註）其中覺得可痛惜者，可以說不在過去而在未來吧。』（註一）這意思就是說，這個不可忘記的皇帝在評價這個死去了的詩人的時候，並不看他在短短的生涯中寫留下來的那偉大，乃看他將來將會在相當的警察的監督與指導之下寫出的那東西的。尼古拉想從他那兒期待着像庫珂里尼克的戲曲「至尊的手救祖國」似的那種「愛國的」作品。連非常優秀的宮廷詩人，那不是此世的歌人V. A. 球珂夫斯基似的人，都努力想把對於道義的尊敬教給普式庚。在一八二六年四月十二日發的信中，他說道——『我國的青年（即不斷地成熟起來的一代人），因爲那不給予生活

（註一）西車戈雷夫的「普式庚」彼得堡一九二二年版，三五七頁。